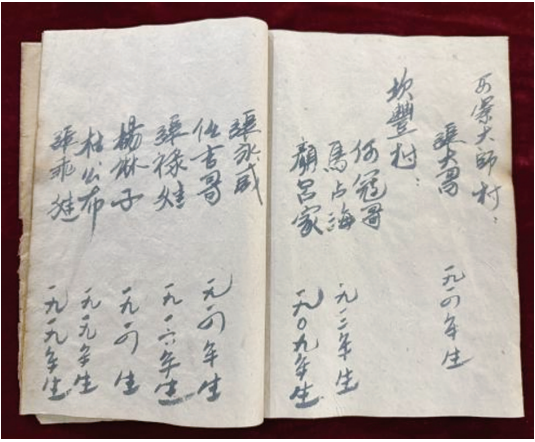


革命文物选萃

《岷州入伍青年名册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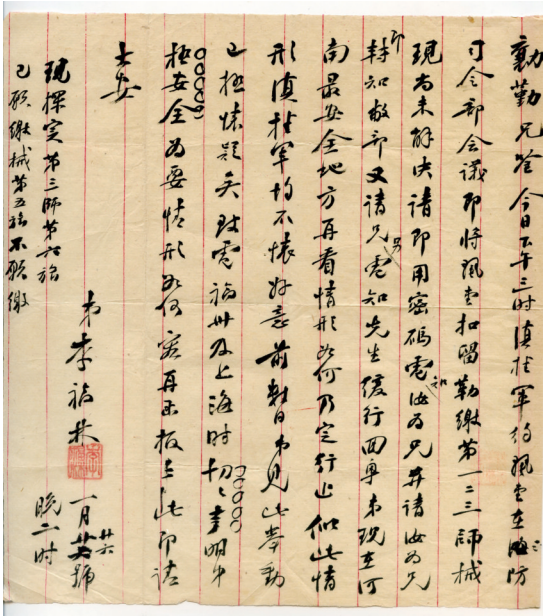


1936年8月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抵达甘肃省岷县，在此作战休整的60余天里，按照中共中央指示，红四方面军开辟了以岷县为中心的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。其间，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“岷州会议”，并在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，迅速开展建党建政、建立地方革命武装、扩大红军、支援前线、筹粮筹款等一系列革命工作，共筹集军粮400余万斤，有3000余岷州儿女踊跃参军，使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。岷县根据地的建设，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奠定了良好基础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刘伯承元帅在回忆录中称“岷县是红军长征的加油站”，生动概括了其历史贡献。

《岷州入伍青年名册》为国家一级文物，长25厘米，宽18厘米，纸本墨书。名册中记录了部分当年踊跃参军的岷县籍战士的基本信息，是这段光荣历史的重要实物见证。

（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会议纪念馆 雷云）

李福林写给古应芬的信



李福林(1874—1952)，字登同，广东番禺(今广州市)人，1907年于新加坡加入中国同盟会。曾参加辛亥革命、护法运动等。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现藏有李福林致古应芬函(1923年1月26日)。此函为国家一级文物，是孙中山晚年第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历史物证。

信函写道：“今日下午三时，滇、桂军约丽堂在江防司令部会议，即将丽堂扣留，勒缴第一、二、三师械，现尚未解决，请即用密码电知汝为兄，并请汝为兄即转知敝部；又请兄另电知先生缓行回粤。弟现在河南最安全地方，再看情形如何乃定行止。……”

1922年夏，陈炯明部在广州发动兵变，孙中山离穗赴沪，积极联络滇、桂及粤军进行讨伐。1923年1月15日，陈炯明部被逐出广州，各路讨陈力量电邀孙中山南下主持局面。不料，同年1月26日，桂系将领沈鸿英在广州制造“江防事变”，企图控制广东。李福林时任东路讨贼军第三军军长，事变发生时在广州河南(今海珠区)，他立即函告在香港负责联络讨陈工作的古应芬(字勳勤)，并请其转告孙中山暂缓返粤。孙中山随即中止返粤计划，并命令在粤同志召集各部，平定沈鸿英叛乱。2月21日，孙中山抵达广州，并于3月2日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。

（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朱志龙）

《觉陇》月报

保至善(1902—1928)，字乐延，出生于甘肃省崇信县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大革命时期党在甘肃的领导人之一。

1924年3月，保至善考入国立西北大学，与校内甘肃籍学生一起建立“旅陕甘肃学生会”，并以“促甘肃之觉醒”为宗旨，创办《觉陇》月报。1926年3月，保至善在《觉陇》月报第二期刊载《崇信教育局长竟如斯耶》一文，文章痛斥当时的崇信教育局局长王安堂上下勾结、贪污腐败、欺压学生的行径，呼吁人们认清崇信教育界的腐败问题。同期还刊载了大革命时期甘肃王孝锡所写的《青天白日》一文，既宣传了革命的思想 and 主张，也表达了王孝锡对革命的崇拜和向往。

大革命失败后，保至善不幸被捕。1928年春，他在郑州被反动当局杀害，年仅26岁。王孝锡在家乡坚持斗争，1928年11月不幸被捕，同年12月30日被敌人杀害于兰州安定门外萧家坪城隍庙前，年仅25岁。

2022年6月，在甘肃省文物局组织全省可移动革命文物鉴定工作中，这份出版于90多年前的《觉陇》月报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，并列入甘肃省第二批珍贵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。

（保至善纪念馆 牛旭东）

抗战时期的冀南银行

马琳

于发行专属货币，整合区域金融体系。这种新型货币依托根据地实际物资储备发行，在民众中建立了较强的公信力。该行通过科学调控货币供应量，优化资金周转效率，不仅维持了物价的基本稳定，更确保了战时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。

在金融管控方面，冀南银行实施了多项重要举措。严格防范伪造货币渗透，严厉惩处非法炒卖货币行为，确保冀南币的市场主导地位；颁布严格的汇兑管制条例与金融法规，压缩非本位币的流通空间，积极引导民众使用冀南币；着力提升货币防伪水平，持续优化印钞工艺，增强票面防伪标识，有效遏制假币流通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。

冀南银行充分发挥金融杠杆作用，通过信贷业务有效支撑了根据地经济体系运转和抗战事业推进。在农业生产领域，该行推行优惠贷款政策，使农户能够以较低成本购置耕作物资，包括优质种源、农用器械及畜力资源，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。这种惠农金融措施极大调动了农户生产积极性，促进粮食产出持续增长，有力保障了边区粮食安全。除主粮种植外，银行还资助农户发展家庭手工业，如禽畜饲养和手工纺织等创收项目。

在工业建设层面，冀南银行重点扶持军工制造、纺织加工及矿产开发等关键产业，为企业提供必要的运营资金。这些工业企业不仅满足了军民日常用品和武器装备需求，更成为根据地的经济支柱。同时，银行还通过商业信贷网络，促进商品跨区域流通，从而维持市场活力，确保边区物资供应体系正常运转。

冀南银行作为战时经济体系的核心机构，承担着为抗日斗争提供金融支撑的关键任务。该行采取发行战时债券、吸纳民间储蓄等多种融资方式，有效解决了八路军军费短缺问题，确保部队后勤补给和装备更新得以顺利进行。冀南银行募集的资金在购置军火、维持部队给养等关键环节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不仅如此，该行还深度参与根据地后勤体系建设，统筹物资调配与运输网络建设，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
在金融稳定与经济建设层面，冀南银行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通过维持物价稳定和保障物资供应，不仅改善了根据地民众的生活条件，更显著提升了群众参与抗战的积极性，从而构建起军民同心抗敌的有利态势。

冀南银行将金融知识普及作为重点工作推进。采取多种渠道如创办金融刊物、张贴宣传横幅、组织专题培训等形式，向根据地民众传播货币政策和金



平原版冀南币 100元(1945年)



平原版冀南币 50元(1939年)



太行版冀南币 5元(1939年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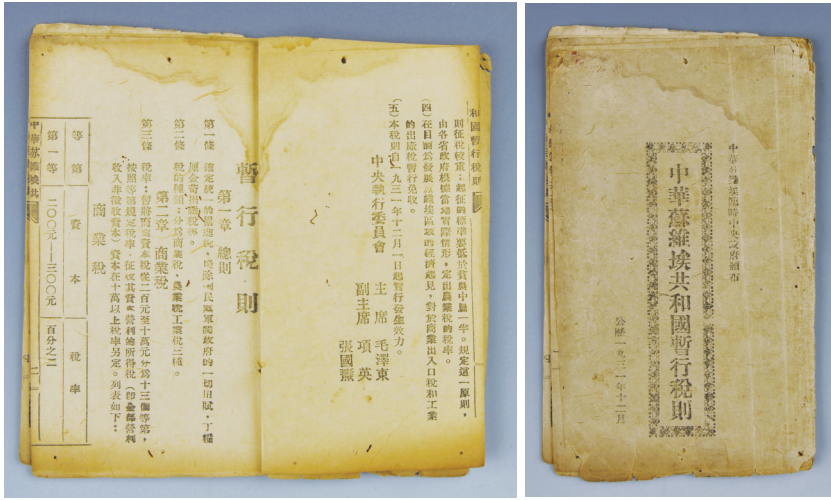
融常识，有效提升了群众对冀南币的认可度。

此外，该行还肩负着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重任。通过开设专业技能课程、组织业务研讨等途径，培养了大批精通金融实务的专业人才，不仅为银行自身发展建设提供支持，更助力根据地金融体系的完善。这批专业人才在抗战期间贡献突出，同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金融体系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中国共产党在冀南地区创建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金融机构。这一决策基于对战时经济与

“赤色中国”第一部税法——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》

杨卫 陈书迁



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》

比可以看出，农业税是中央苏区最重要的税种，也是中央苏区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。在农业税的条款前，加了一条“注”：鉴于复杂的情况，“不能规定一个统一的税收办法”，而是规定了农业税的征收原则，还赋权于各省可以依据原则，根据实际情况“定出适当的农业税”，这体现了暂行税则既考虑了原则性，又兼顾了特殊性。因此，农业税中虽然和商业税一样公布了农业税分12个等级，税率从1%至16.5%，但同时也说明“附江西省农业税征收办法以作各省的参考”。

第四章工业税，包括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，条款中虽然规定了按照资本的大小，规定的税率征收利润，但同时还规定“为促进苏区的工业发展，暂时免收工业品的出厂税”。

第五章附则，只有第二十二条一条，即规定暂行税则自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。

暂行税则在1931年11月28日，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签署颁布，并决定“本税则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起实行发生效力”。

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，1932年7月13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发布第七号命令《关于修改暂行税则问题》，命令指出：“本执行委员会鉴于目前革命的需要与保障革命的胜利起见，因此必须变更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所颁布的暂行税则的税率。”1932年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《修正暂行税则》，在税基、等第、税率、纳税形式及征税期间和减免免税等方面，相对于《暂行税则》都有了较大的修改。

具体而言，商业税：税基由200—100000元变为101—500000元；等第数量由十三等变为十四等；税率由2%—18.5%变为6%—25%；免税政策由“肩挑小贩免收商业税”“商业资本二百元以

下的一律免税”变为“肩挑小贩资本在一百元以下免收商业税”“商业资本一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税”。

农业税：纳税标准和次数增加了“富农按劳动力平均（而不以人口平均）计算收获与纳税标准”与“每年收获麦谷二次者，应征税二次”；纳税形式由“农业税征收现款或农产品”变为“农业税征收现款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币为限，其余的杂洋币不收”；免税政策由“红军家属按照红军优待条例免税”“雇农及分得田地的工人一律免税”变为“红军家属（限本身父母妻子及无劳动力的弟妹）按照红军优待条例免税”“雇农及分得田地的雇佣工人苦力本身和妻子一律免税”。不难看出，修订后的税基降低了，税率提高了，税负明显增加。针对修订后出现的问题，又陆续出台了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颁布的《关于商业所得税征收细则》（1932年8月16日）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、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财字第十五号《关于统一税收问题》（1932

年8月16日）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二十号《为几种商业品减税问题》（1932年8月26日），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十一号《关于商业税与店租之征收事宜》（1932年12月5日）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（第十八号）《关于整顿商业税问题》（1933年4月21日）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税免税减税暂行条例》（1934年8月1日）等完善税收政策。

暂行税则从1931年12月开始实施至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被迫撤离中央苏区，虽然只有3年左右，但在政治层面，它是中央苏区建立的第一个较为现代化的财政税收体系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；在经济层面，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中央苏区政府财政支绌的状况，改善了中央苏区的经济条件，为中央苏区的建设提供了经费的保障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西省博物馆）